

# 日常生活视域下的北宋东京(汴梁)城市空间研究

朱海声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梳理了在城镇化发展历程中日常生活城市空间中面临的困境和突出问题,阐述了东西方关于城市空间中日常生活研究的思潮,评析了汴京日常生活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以北宋东京(汴梁)为研究对象,解读北宋东京的城市格局、建筑形态、商业布局等特征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度等内容,提出北宋东京城市空间从“混沌”到“共享”的营建策略,以资当代城市规划和建设加以借鉴。

**关键词:**城市空间;北宋东京(汴梁);日常生活;商业街区;混沌;共享

**中图分类号:**TU9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0)02-0012-08

## 一、研究缘起

快速城镇化发展反映在城市建设中,出现了伴随着价值评价标准混乱的城市多重尺度上的形态、城市肌理和空间尺度的破碎和异质化。城市公共资源的分配忽视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维度。当城市发展被简化为空间的生产时,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尺度,把人的日常生活也带入了无度。当城市被功能化和理性化时,并没有考虑到城市居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果使城市生活空间单一,失去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理性空间中,城市里的建筑物成了孤立的单元,否认了人们活动要求的流动性、连续性的空间这一事实。面对这些困境,并不仅仅是中国特色,放大到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从工业革命开始时陆续出现,但真正变成一种普遍的、结构性的问题和模式,是在城市交通方式的改变和现代高层建筑为基础的都市模式成为样板之后,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在维度则在城市空间中变得干瘪和萎缩。对日常生活的认识 and 解读,是西方人文主义学者关注的课题。

法国城市规划的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早年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战结束后西欧的城市化使其开始转向思考具体的社会问题。作为城市空间实践探讨的批判对象,他在《日

常生活批判》中提出新型的异化特征,即人被以“现代城市”为表征的空间生产迷惑了,人仍旧被控制在无休止的生产体系中才能生存。美国社会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对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有所继承。戴维指出:“城市化在吸收剩余资本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在不断地扩大其地理范围。它的代价是一个不断地建设性摧毁的过程,意味着对城市大众任何一种城市权力的剥夺。”<sup>[1]23</sup>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所著《日常生活》继承了她的老师卢卡奇(Gyorgy Lukacs)《审美特性》中关于日常生活世界和艺术科学的关系的基本思路,强调社会在微观层次上的改变,即日常生活的人道化的重要性。她在开篇即将“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sup>[2]3</sup>

城市公共空间在当代我国社会现实中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给予充分的重视。我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关于“日常生活”的研究,主要是以城市更新为起点,借鉴西方关于城市更新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展开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吴良镛提出的“有机更新”的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理论指导下实施了多个北京旧城居住区的更新改造项目。实际上,这些实践策略主要是以“小尺度、小规模、渐进

收稿日期:2019-09-03

作者简介:朱海声(1966-),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高级建筑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城市空间环境。E-mail: 2571182340@qq.com

式”为主的城市物质环境的更新及其改造,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关注城市空间与人的日常生活关联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与城镇化背景下,本文选取宋代都城东京(汴梁)为研究对象,旨在提出城市空间不仅是一个形体空间,同时也是城市生活和参与城市生活的更为广泛的市民的权力,谁的城市空间,谁的城市街道?在日常生活的维度下思考城市空间的价值和意义,或许能为当下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一个多元的实践路径。

## 二、空间演变

秦汉以来,既为了便于城内工商经营区与居民区的防御,更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块的管理,古代主要由都城与中心城市来体现的封闭的坊市制已初见端倪。到北魏修建洛阳城时,遂形成一种规划周详,棋盘式的里坊制城区布局。此后坊市制持续了数百年,到了唐代后期才逐渐瓦解。

随着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工商业日趋繁荣,从唐代末期到北宋前期,封闭的坊市制逐渐被开放的街市制所取代。考古文献及文献资料表明,北宋中期开始出现新的城市规划以及与之相应的管理制度,是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制度大为松弛这一历史大趋势的产物。

回到对城市空间各种维度的分析上,我们可以说,北宋东京的城市布局是以“三套城墙,四水贯都”形象为主的。城市的职能从满足统治阶级者要求为本的《考工记》模式,逐步转向以经济活动占有重要地位的城市秩序,体现了人本主义的生活场景。由于坊市制的崩溃和街市制的兴起,城市中商业街巷、书院、寺庙、官府、宅邸比比皆是,餐饮、服务业等空前发达,文化娱乐场所,勾栏瓦肆点缀城市空间之中。与隋唐长安城的坊市制,严格的东、西市场的块状布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图1)。

从日常生活的视域看,隋唐长安城与宋代都城的营建思想体现了完全不同的经营策略。前者,即帝王意志下的权力体现,作为皇权制定下的意识形态与制度,表象与意志的城市组织,实际上,它建立起了一个“压抑性空间”。为了体现“官民不相参”的规划思想,权力性的宫城,定居性的坊市以及商业模式被限制在严格的边界线之内;后者,由于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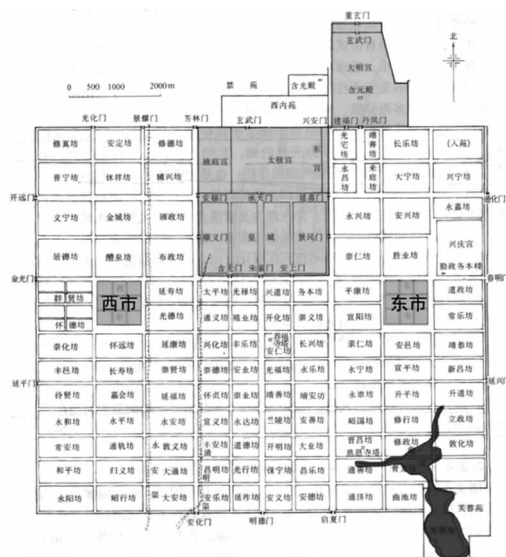


图1 唐长安城复原平面

间镌刻于空间之中,人们被允许充分地使用时间与地点,充分地参与城市日常生活实践,因而具有了城市权的某些特征。具体而言,宋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城市权利:诸如行为与街道、身体与记忆、符号与意义等,皆转化成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自为性空间,即“人性空间”。

以上比较,是我们讨论宋代都城东京城市空间和人们日常生活关系的起点。

## 三、文献、宫城及其城市空间

### 1. 汴京关于日常生活询证的文献内容评价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是关于北宋后期东京汴梁地理风物的一部重要文献。除了记述京城的城市布局、河道走向、内城宫殿等物质空间外,还有大量的礼仪、风俗等关于日常生活的领域。另外,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著作也对南宋临安的城市空间及人文习俗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述。耐得翁的《都城纪胜》,此书虽卷帙不大,但对当时南宋都城临安的市民阶层的生活与工商盛况的叙述,较一般志书记载还具体,因而《四库提要》称其“可以见南渡以后土俗民风之大略”,为研究这一时期杭州的时俗民风提供了重要资料。

这些历史文献记述了宋代城市中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宗教、风俗等内容,是我们解读宋代城市日常生活场景的重要历史文本。

### 2. 从《东京梦华录》看人性空间及其形态

宋代都城的皇宫御街,即从宫城的宣德门开

始,经过里城的朱雀门,直至外城的南熏门结束,整个城市并未以此轴线形成对称布局,这与都城的演变史密切相关(图2)。据史料记载,早在战国时代,魏国就把都城迁到这里,称为“大梁”。以后五代时期除了后唐的都城建在洛阳外,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在此建都。北宋的汴梁,实际上是继承后周留下的规划布局。由于漕运的便利,应当说是比较理性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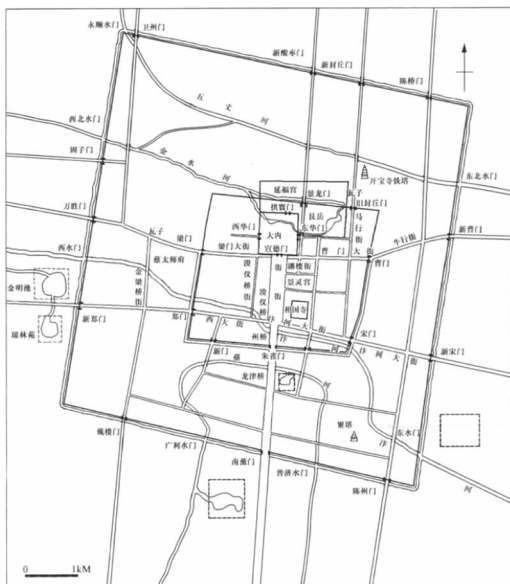


图2 北宋东京城市结构

从宫城正门宣德门一直往南,宽二百余步,两边设有御廊,各立黑漆杈子,路中间又有红漆杈子两行,中间御道。这里“旧许市人买卖期间”,宋徽宗(1101-1125年)政和年间起官府下令禁止买卖。实际上,这一段御街在徽宗时期形成了一个政治性的广场,成为了宫廷文化活动的场所。例如在元旦、冬至的大朝会以及上寿的庆贺活动中,百官都在这里排队等候,而从御街中段的州桥到朱雀门,从朱雀门到龙津桥一带商业极其发达,布置了许多酒店、饮食店、买卖各种荤素食品、蔬菜、果品等。

《东京梦华录》卷二中对御街、宣德楼前府官宁、州桥夜市均有详细的描述,而且这一带的夜市尤以为盛。可见,正是宋代城市中新兴市民文化的勃起,广大中下层市民需要参与商品交换,参与文化娱乐,从多种途径寻找自身的社会价值,使得都城的空间布局、商业业态、文化娱乐极为丰富多彩。值得一提的是,“北宋东京的这种宫城、御街与城市空间的关系,除了反映出宋代统治阶级对传统礼制

秩序的追求外,还对以后各代的都城规划和营建思想有直接的影响”<sup>[3]25</sup>。

### 3. 汴京日常生活的结构与城市街区的关联

所谓日常生活的结构就是人们在城市空间中的重复性实践和规范性的约束。例如,人们在城市街道中的公共活动、商业交易中心的行为模式以及娱乐空间中的情感表达等。当然,这种结构一定是和城市的道路布局关联在一起的。

北宋东京的城市道路布局是以宫城为中心的辐射式与方格网相结合的路网系统,主要交通干道正对各个城门,形成井字形的方格路网,次一级的道路也是方格形的。从《东京梦华录》的描述来看,东京的商业,一般分布在主要八条街巷中,其中包括四条御街和四个商业街区。

四条御街,除了上文谈到的宫城南门御街外,第二条东面御街,即汴河大街,出里城旧宋门,到外城新宋门。商业形态主要以客店居多,比较符合南来北往的客人的需求和便利。其中临汴河著名的十三间楼,是为从汴河来的客商准备的大型客栈。在这里,利用汴河,定都开封;经营汴河,繁荣都城,这些举措都体现了赵宋社稷的利益。

第三条御街,西面御街,即四大街,自州桥向西,出里城旧郑门,到外城新郑门,直至西郊的金明池和琼林苑。商业业态主要是果子行,花果铺席。再往西皆为妓女馆舍,都人谓之院街。就州桥作为日常生活的场所,无疑是宋代城市空间的一个重要节点,它既是南北御街的连接点,也是东西御街的聚集点。《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州桥,正对于大内御街,其桥与相国寺桥皆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过,桥下密排石柱,盖车驾御路也”<sup>[4]27</sup>。而从商业的分布来看,州桥在轴线御街上起到了南抑北扬的作用,自然地划分出了礼制空间和日常商业空间的界限(图3)。

第四条御街,即北面御街,从宫城宣德门东去,经过潘楼街,过宫城东南的东角楼,这一区域著名的是潘楼酒店,楼下即为集市,街南分布有最大的桑家瓦子,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四个商业街区,主要包括艮岳东面马行街及南北段,宣德门前大街,宫城东华门一带以及景灵宫东门大街和相国寺大街等。它们的商业模式,商业业态在《东京梦华录》中均有详细的描述,为此,本文不做赘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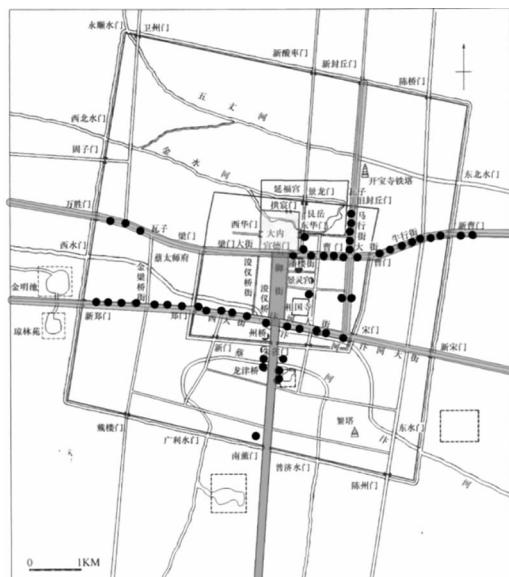


图3 北宋末年东京主要商业分布

回到日常生活的结构来看,四条御街和四个商业街区的能指和所指都表明了一种文化符号的功能和意义。

#### 4. 汴京日常生活的图式与商业空间的情境

从宋代东京商业的空间实用性来看,一是分布在城市的主要干道上,例如四条御街;二是靠近宫城附近的街巷片区,形成了人们购物的回转空间,这也符合人们日常生活的特性:重复性、经济性和情境性。从商业涉及的对象看,既有服务于达官贵人的宫城东华门商业区,也有服务于大众日常生活的商业零售铺面,同时也有官民混杂的相国寺大街等。特别是相国寺“不仅是宋代文化艺术、商品交易的结晶,于宋代文人深层的思维模式当中,亦不断衍生出因果相报的教化观念。”<sup>[5]21</sup>这一阐释尤为重要,因为商业以诚信为媒介,而诚信中的宗教信仰使得商业模式能在公平中进行交易,形成理想的共同体。所以,正是相国寺的宗教文化塑造了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

可见,汴京商业的实用性特点由于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他们的生活及其情境提供了不同的空间体验。正如埃蒙·坎尼夫(Emon Kanev)指出的:“这样的城市环境,是简练的,易于读懂的空间形态,浓缩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的许多方面,既包括特殊的方面,也包括一般性的方面。这样的空间形态是持久的,当它们被使用的时候甚而荒芜的时候都是宁静的,能够促使人们创造一个彼此

熟悉的环境,建设一个可持续的城市,并鼓励人们相互合作与分享。”<sup>[6]19-20</sup>

#### 5. 汴京与临安及其他城市日常生活的比较

南宋作为宋代城市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东京汴梁相比,既有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性,也有日常生活方面的同一性。金灭北宋,宋王朝迁都于吴越城,改名临安。北方官僚、地主随政权逃亡这里,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梦粱录》记述,“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人口”,“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石,皆需之铺家。”<sup>[7]148</sup>由于商业的发达,城内有大量的流动人口,不少外地客商致富后,也寄寓这里。

南宋临安日常生活的图式与北宋东京相似,也有许多商业分布在御道两侧。南宋御街南起皇城北门——和宁门,经朝天门、北抵城西北之景灵宫。御街中段是临安城市的中心综合商业区,由于增添了各种大型铺店及酒楼、瓦子等,市肆场景更加繁盛,通宵营业(图4)。《梦粱录》记述:“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关于“瓦子”,《梦粱录》的解释是:“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sup>[7]179</sup>实际上,勾栏瓦肆用现代人的理解就是用来指市民文化娱乐的演艺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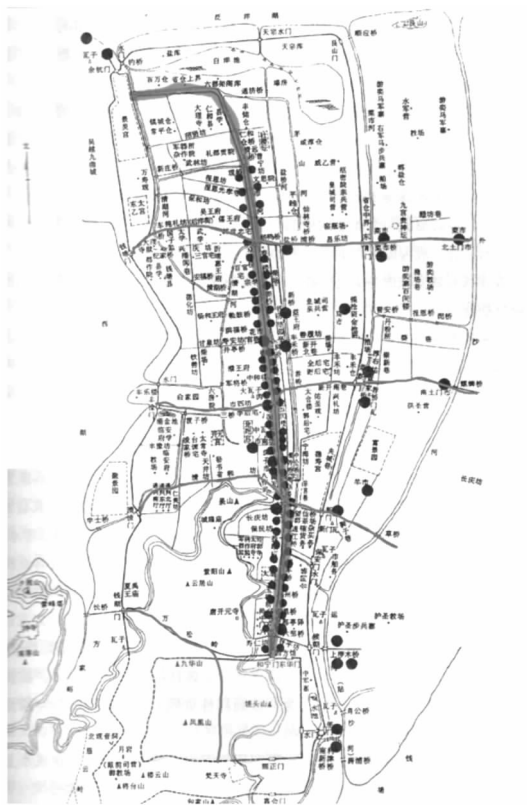


图4 南宋临安城商业网点分布

临安城伎艺杂耍的瓦子分布在城内各处,有一些在城门内外,数目比东京还多。《武林旧事》中记述:“共有二十三处,北瓦内有勾栏十三座,最为繁盛”。还有一些不入勾栏,“或有路伎,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做场者。”<sup>[8]126</sup>

由于南宋临安的地形复杂,城市完全是配合地形,城垣形状很不规则,南宋建都后,只是在原有基础上稍有改建,官署也多利用原有建筑分散各处,道路系统也较杂乱,但是作为主要街道的御道也完全与商业大街结合在一起。而瓦子的分布和数量较东京多,商业街市也比东京更繁荣。

综上,通过对宋代都城的商业布局和日常生活的阐释,以及汴京和临安日常生活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宋代都城勾栏瓦肆中日常生活的情境,实际上为我们叩开了解读宋代城市空间一个“善”的叙事通道——一个健全、宽容、风雅的城市土壤,蕴含着人们从“自在”向“自为”的转向,为此,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有句精辟的论述:“所有‘自为的’对象化都体现了人的自由,并表达了人性在给定时代所达到的自由的程度。”<sup>[2]115</sup>这或许是对宋代都城城市空间的一个合理的佐证。

#### 四、《清明上河图》与混沌空间

张择端描绘的《清明上河图》是北宋东京的东南一角。整个画面有五个部分组成,近郊近景色、汴河风光、虹桥上下、城楼前面、繁华街市。

虹桥是《清明上河图》全画的中心之一,也是全画中人物最密集,空间密度最高的一段。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自东水门外至七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从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屋架,饰以丹雘,宛如飞虹,其上下土桥亦如之。”<sup>[4]26-27</sup>一座不设梁架的虹桥横跨汴河,城市的公共空间即从虹桥开始(图5)。

虹桥横跨汴河南北两岸,两头都连接着街道,尤其是南岸。从虹桥南岸的十千脚店,经过城门,直至画面尽头的孙羊店和赵太丞家,是一条“混沌”的空间带。

根据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的理论,“混沌”是一种包含有序的自然纯朴的状态,是指在毫不相干的事物、事件之间,蕴含潜伏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混沌就是在简单中蕴含的复杂,在确定



图5 北宋东京虹桥景观

性种包含着随机性,简言之,混沌就是无序和有序的统一。具体反映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可以看出,正是因为这些“混沌”的空间带,才使得《清明上河图》中各种建筑类型、各种人物属性、各种社会活动、各种交流方式得以并存,给人以鼎沸市声,恍若可闻的心理感觉。其中,混沌的“小空间”的确起到了活跃城市氛围的主要作用。

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yte)在《小城市空间的生活》中所倡导的“剩余的空间”“凹进去的空间”“零星的空间”,则可在《清明上河图》中找到清楚的位置。实际上,这些小空间的出现,成为了宋代城市尺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体现了小空间在城市功能中的价值和意义。例如虹桥上搭建的席棚、遮阳伞、地摊,虹桥东南角的饮料亭,城楼内侧的修面摊位,在一颗柳树下,用竹席搭起用来算命的小棚,赵太丞家左侧的水井,水井东面支着遮阳伞在卖佛具的僧人以及说书的场地等等。正如扬·盖尔(Jan Gehl)在《人性化的城市》中指出的:“正是这些小空间的投放显示了城市空间的质量和人性化的尺度。”<sup>[9]169</sup>

##### 1. 城市节点与十千脚店

十千脚店是《清明上河图》中虹桥南端的一个重要城市节点。在酒楼中,脚店次于正店。十千脚店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所以建筑形态丰富。它由四合院的餐饮楼和装饰性极强的“彩楼欢门”组成,“彩楼欢门”大致与虹桥平行,餐饮楼与汴河平

行,十千脚店在此的位置,既有转向的作用,也暗示了进城的方向(图6)。



图6 彩楼欢门的位置及形态

就彩楼欢门而言,是一组独立的构架围成的四方形,它的构造和造型即平地立柱,纵横用粗细不同的方木绑扎,顶部高高耸起一组三脚架,类似于欧洲中世纪哥特式教堂的尖顶。在整个虹桥的范围内,具有明显的标示性和导向性。

彩楼欢门的中部用红、蓝两色布围起来,上面高悬一面酒旗。上书“新酒”二字。檐下两侧则挂着“天之”、“美禄”两块木牌。《汉书·食货志》说:

“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可见,酒店经营者的良苦用心,目的是招徕顾客。建筑由四合院围合而成,面向汴河为二层歇山屋顶,有平坐、栏杆、山墙面有悬鱼、引檐、落地窗棂,显现出宋代建筑“醇和”的特征。

经过彩楼欢门,进入脚店二楼,凭栏远眺,视线开阔。汴河之上,船只相连,有的满载货物,溯河而上,有的泊岸卸货,空船而归,一派繁忙景象。虹桥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象》中所言:“无论如何,成功的节点不但在某些方面独一无二,同时也是周围环境特征的浓缩。”<sup>[10]59</sup>的确,十千脚店在此作为一个城市节点,具备了一种特殊的空间想象和城市的视觉形态。

## 2. 城市标识与城楼尺度

在整个《清明上河图》中,城楼是一座规模最大的建筑单体,它与上述虹桥不同。虹桥连接两岸的交通,在视觉上不会把画面割裂,而城楼作为大尺度的建筑物,其本身的目的就是划分出城内和城外两个空间,进而形成了一个明确有利的标识物(图7)。



图7 《清明上河图》中的城楼

从图像学的角度分析,《清明上河图》中城楼的建筑形式为单檐庑殿顶,檐下三层斗拱,红色油漆。从城市的主干道来看,无论距离远近,城楼突出的尺度和高大的轮廓,与周边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因此,作为城市标识物的地位得到了极大地提升。

城门外,纵观虹桥到城楼之间的交通要道,传统城市空间的属性明显,出现了两个非几何化的十字路口。第一个十字路口,除了建筑物界定的城市空间外,日常生活的场景有运动的棕盖车、等人的

棕盖车。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这是专供“宅眷坐车子”。另外,车辆修理店、行人以及卖杏花、卖大饼的人、看相算命的摊位等等,构成了丰富的城市社会空间,强化了“混沌”空间隐含的社会秩序。

第二个十字路口,即城门外的桥头十字,显然,护城河上没有汴河上繁忙的漕运。护城河两岸,绿树成荫,清晰宁静。唯有桥上的行人与周边的环境形成对比。例如串车、行人、商贩、残疾人、行乞者、观河之人,出城的骆驼队等等。这里,城楼尺度不仅触动了人们的视觉,同时也触动了人们的听觉。



### 3. 孙羊店及其周边环境

和前文提到的十千脚店相比,孙羊店的门面装饰更加华丽,彩楼欢门不但大,而且缀满了绣球、花枝,底下有栅栏,两个地灯上分别写着“正店”“香醪”。《东京梦华录》记载:“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余皆为脚店”。其中最有名的是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阑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吴自牧在《梦粱录》里也提到:“东京杨楼、白矾、仙楼等处酒楼,盛于今日,其富贵又可知矣。”<sup>[7][142]</sup>因此,有学者研究认为,张择端画的这一家孙羊店应是七十二家之一(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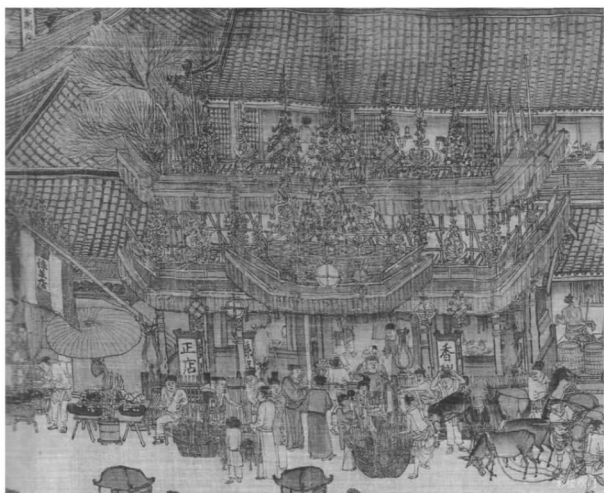


图8 《清明上河图》中的孙羊店



图9 《清明上河图》中十字路口的生活场景

《清明上河图》中孙羊店的西面,画面的最后一个十字路口,有两处社会空间引人注目,一处是东北拐角处的说书处。北宋以来,娱乐业非常兴盛,杂剧、唱曲、杂耍、傀儡、舞蹈、小说等;一处是西南角,两坡顶的建筑北面是一个竹棚,有许多人围坐着在听一个老人说书。这种城市景观(图9),正是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称道的“空的空间”——瞬间形成。在这个“没有间隔,没有任何障碍的完整场地”,从说书人一开始,“乐师、演员和关中就开

始分享同一世界”。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城市空间有声有色的活力,从一个窗口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境界,说明当时的东京汴梁,城市居民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 五、结 论

本研究回溯传统城市的社会逻辑、日常生活和城市空间的根本关系重新进行阐释,目的就是要揭示出宋代都市空间中,人的存在感从“自在”向“自为”转变的意义。应当看到,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当理性空间或者说是“城镇化”本身,变成一种发展目的和终极目标时,城市最重要的主体——人的日常生活变得摇摆不定。综合以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 1. 日常生活的真实世界揭示了传统城市空间的包容性

日常生活是一种基于体验和实践的真实世界,它体现出了一种大众的生活节奏和城市文化的丰富性,更进一步的解释,就是宋代都城城市空间不仅是由实体空间组成的物质堆,更重要的是由社会空间组成的具有包容性的“善的空间”。善的空间本身并不是由一个空间的承载力决定的,而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 2. “混沌”到“共享”的特征蕴育着城市设计的人文价值

从“混沌”到“共享”的城市空间组织,成为宋代都城特有的人性化场所。

看似“混沌”的城市空间带,实际上是人们生活习惯和社会关系赖以维持的整个组织的基础,它们蕴育着人们对这些生活的合作和忠诚。因此,宋代都城东京(汴梁)人们“共享”城市空间成为了可能。

### 3. 三位一体的城市空间特征体现了宋代都城的营建策略

由于城市空间、商业建筑、日常生活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城市秩序是相互渗透、相互共生、彼此交感的空间体验,城市空间和社会通过公共和私有空间相互关联而形成,而且,传统建筑作为一种语言,一种能够与大众进行有效沟通的公共语言,和公众的日常生活有了深度融合,体现了宋代都城城市空间的营建策略。

## 参 考 文 献

- [1] 戴维·哈维. 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力到城市革命[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2] 阿格妮丝·赫勒. 日常生活[M].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 [3] 郭黛姮. 中国古代建筑史:第3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 [4]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M]. 王永宽,注译.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
- [5] 包伟民. 宋代城市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 [6] 埃蒙·坎尼夫. 城市伦理——当代城市研究[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 [7] 吴自牧. 梦粱录[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 [8] 周密. 武林旧事[M]. 钱之江,校注. 杭州:浙江古迹出版社,2011.
- [9] 扬·盖尔. 人性化的城市[M]. 欧阳文,徐哲文,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 [10] 凯文·林奇. 城市意象[M]. 方益萍,何晓军,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 A Study on the Urban Space of Dongjing (Bianliang)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ife

*ZHU Hai-sheng*

(Academy of Arts,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mbs the dilemma and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daily life of urban space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expounds both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trends of thought in the study of daily life of urban space, and makes comments on the document literature of daily life in Bianjing. Accordingly, taking Dongjing (Bianliang)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aper interprets not only th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city pattern, the architectural form, and the commercial layout, and also something relevant to people's daily life.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that the urban space is build from chaos to sharing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is analyz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nowadays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Key words:** urban space; Dongjing (Bianliang)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daily Life; business district; chaos; sharing

【编辑 吴晓利】